



中国共产党

英烈小传

第二集

中国共产党 英烈小传

(修订本)

第二集

西北师范学院政治系 ~~中共党史教研室~~ 编

甘肃人民出版社

**中国共产党
英烈小传**

(修订本)

第二集

西北师范学院政治系 中共党史教研室
资 料 室 编

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

(兰州第一新村51号)

甘肃省新华书店发行 兰州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1/32 印张6.5 字数122,000

1982年4月第1版 1984年4月第2次印刷

印数：11,966—32,665

书号：11096·45 定价：0.45元

赠 言 读 者

《中国共产党英烈小传》记述了在我党有较大影响的先烈人物的战斗历程，他们可歌可泣的英勇事迹，读来常常催人泪下，感人奋发。这是送给人们最好的精神食粮，是促进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有力武器，同时也是我们怎样做人的历史样板。

人们读中国近代史和现代史，会看到旧中国支离破碎，民不堪命的悲惨情景，在那暗无天日的日子里，有志之士，为了拯救中华，不怕牺牲毅然与敌搏斗的精神，不禁使人拍案起奋，赞叹不已。这些为国为民的英烈，都会得到人们的纪念和尊敬。读《中国共产党英烈小传》，会使人们对这些英烈更加崇敬。这是因为他们不仅无私无畏地与敌作斗争，更坚决地站在斗争的最前列，而且因为他们带领人们走向更有希望的共产主义的美好前程。先烈们坚信社会发展的规律必然走向共产主义社会，因而在极端恶劣的环境下，他们对自己所从事的伟大事业充满了必胜的信心。并为之而英勇献身。现在，三座大山推倒了，新中国建立了，社会主义现代化

建设正在突飞猛进地向前发展，共产主义事业天天在中国增长，先烈们的理想变成了现实，先烈们的事业正由后来人接续不断地干下去。我们学习先烈，就要学习他们正确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革命精神，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为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奋斗不息。

《中国共产党英烈小传》是部好书，是教育人们尤其是青少年的极好教材，特别是在当前防止和清除精神污染中，它重新出版，更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先烈们给我们留下了共产党人的光辉传统和优秀品质，他们把为人民的利益牺牲个人的一切视为最高尚的道德，这对于个人至上论者是有力的批判。一个人有了崇高的革命理想和高尚的道德品质，就会克服重重困难而历险前进。读这部书，就要从这方面吸取力量。希广大读者切记这个重要目的。

杨 植 霖

一九八三年十一月

目 录

赠言读者.....杨植霖

陈 然..... (1)	蔡树藩..... (95)
江竹筠..... (8)	向秀丽..... (99)
许晓轩..... (16)	林伯渠..... (103)
丁佑君..... (21)	陈 赓..... (114)
任弼时..... (28)	李克农..... (129)
杨根思..... (45)	雷 锋..... (138)
杨连第..... (52)	罗荣桓..... (146)
邱少云..... (58)	周保中..... (161)
黄继光..... (65)	焦裕禄..... (173)
黄 敬..... (71)	邵式平..... (182)
安业民..... (82)	王 杰..... (187)
杜凤瑞..... (87)	赖传珠..... (194)

陈 然



陈然同志，小名香哥，又名崇德，北京市人，一九二三年十二月十日（农历十一月十一日）出生于一个职员家庭。

陈然同志的父母本是江西人，父亲陈凤书为寻找生活出路，于一九二一年考进海关工作，家迁河北香河而改籍北京。一九二五年，陈然同志随父亲到了上海，曾先后在静安寺、西区小学读书。一九三四

年冬，陈然同志又随父母到杭州、芜湖继续上小学。在辗转途中，陈然耳闻目睹祖国大片土地沦陷，日本侵略者到处横行霸道，烧杀掳掠，中国人民在水深火热之中过着颠沛流离的苦难生活，在幼小的心灵中产生了对侵略者的无比仇恨。

一九三七年七月，抗日战争爆发。十一月，陈然同志随父亲来到湖北沙市，进入沙市职业中学读书。由于小时候的

动荡生活，致使他的学习基础甚差。但是陈然同志毫不灰心，他上课认真听讲，放学回家坚持自学，刻苦钻研，看报时总是一边看，一边查地图，从中国到外国，不断扩大视野。他关心战局的变化，注意探索革命问题。

一九三八年上半年，陈然同志在职业中学一年级肄业。不久，他又随家来到湖北宜昌。这里抗日救亡活动比较活跃，在中共鄂西特委直接领导下，一些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组织了“抗战剧团”，宣传我党的抗日救亡主张。同年夏天，陈然同志参加了这个剧团，当时他只有十五岁，在孩子剧团工作。他们一面在街头演剧宣传，一面到宜昌、当阳、远安等县的乡下宣传抗日救亡，配合当地党组织开展工作。他积极热情，踏实认真，既是一个演员，唱歌、朗诵、报幕，又是一个后台服务员，搬道具、布置布景，主动承担重担。行军中，他争先背道具和乐器；宿营时，他找房子、扫地，给大家做饭。他的热情态度和吃苦精神，受到了剧团同志的赞扬。在剧团党组织的教育和培养下，陈然同志努力学习马列主义知识，觉悟不断提高，于一九三九年三月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一九三八年十月，武汉沦陷后不久，日军侵占湖北沙市，大批难民逃往鄂西，许多儿童流落街头。根据中华慈幼协会（一个教会组织）的请求，剧团党组织决定派人去当阳前线抢救难童。陈然同志积极参加了这项活动，他冒着敌机的扫射、轰炸，历经艰险，完成了抢救两批难童的任务。

一九四〇年，组织上曾决定派陈然同志去延安。由于日

军在五月份发动了对宜昌的进攻，鄂西发生战事，陈然同志到鄂西后没有找到联络人，因而未能前往。六月，宜昌失陷，陈然同志的家迁到四川巴东县，剧团也撤至重庆。陈然同志无奈，便回到巴东县家中，后又随家到了重庆。

一九四一年，“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反动派大肆逮捕、迫害共产党员和抗日积极分子，剧团被迫解散，剧团的党组织遭到破坏，负责人被捕，个别不坚定分子叛变自首。在这种情况下，组织上决定陈然同志转移到四川江津，等待组织指示。但他去江津后即与组织断了联系，后来由于生活无着，贫病交加，不得已又返回重庆。

一九四三年，陈然同志由其姐夫介绍到伪重庆中粮公司工作。他虽然失掉了组织关系，但仍然按照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积极从事革命工作，团结群众，组织青年，进行革命活动。在中粮公司运输股工作时，他利用提货和押运货物的机会，与码头搬运工人一起干活，与船工一齐划桨、撑篙、拉纤。他曾说：和劳动人民在一起干活，可以熟悉他们的生活，了解他们的思想感情，倾听他们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控诉，从而得到锻炼，受到教育。后来，由于美帝国主义将剩余物资倾销中国，中粮公司南岸机械厂奄奄一息，公司本欲关闭这个工厂，但又怕工人反抗，就派了陈然同志前去维持，自负盈亏。为了不使工人失业，陈然同志多方找门路揽生意，体贴工人疾苦，解决工人困难，并利用工作之便对工人进行思想教育，提高他们的阶级觉悟。

一九四五年，陈然同志在《新华日报》社党组织领导

下，以中粮公司机械厂代理厂长的身份为掩护，用读书会的形式，团结青年进行革命活动。一九四六年一月，在重庆召开旧政协会议时，陈然同志积极组织群众参加各种集会，同国民党特务作坚决斗争。有一天，重庆的进步团体和进步人士为拥护和谈，反对内战，在杨沧白纪念堂集会，向广大群众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内战的阴谋，国民党反动派指使特务捣乱会场，殴打听众，制造了“沧白堂事件”。在这次事件中，陈然同志为了掩护一位进步女青年，奋力与特务搏斗，不顾身上多处负伤，毅然坚持斗争。

人民解放战争开始后，一九四六年秋，《新华日报》社党组织作出关于作好长期斗争准备的指示。陈然同志根据这一指示精神和其他一些党员、进步青年，筹办了《徬徨》杂志，以此联系和团结广大的青年群众。陈然同志负责杂志和读者的通讯联络工作，从中发现和培养进步力量，取得了很好的成绩。

一九四七年二月，国民党反动派对我解放区的全面军事进攻被粉碎后，我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人员开始撤回。二月二十八日，我党驻重庆办事处和《新华日报》社的同志也撤回延安。在这种情况下，许多要求进步的青年，一时显得犹豫、不安。这时，陈然同志遵照《新华日报》社党组织的指示，进行独立作战，一方面坚持把《徬徨》杂志办下去，另一方面积极寻找重庆地方党组织。为了防止敌人的破坏，他把通讯联络工作转移到自己家中。一天，香港新华社给《徬徨》杂志寄来了电讯稿，在满天乌云的重庆，陈然同志



又听到了党的声音。他无比兴奋，就和几个同志商量，决定把有关消息油印散发。这一工作，在国民党反动派一时气焰嚣张，党中央撤离延安，消息隔绝的情况下，起了积极的作用，对于广大群众，以至对于重庆地下党的同志都是一个很大的鼓舞。

一九四七年七月，我党重庆地下组织通过关系和陈然同志等取得了联系，决定在他们原来油印刊物的基础上，正式出版地下党的机关报——《挺进报》。十二月，陈然同志重新入党后，曾任《挺进报》特别支部组织委员、书记，并具体负责报纸的印刷工作。白天，他是机械厂的代理厂长；晚上，他又是《挺进报》的印刷工人。当时，为了安全，印报不宜用油印机，把蜡纸钉在桌上，用一块竹板蘸上油墨代替橡皮滚。由于设备简陋，加之他又没有搞过油印工作，因此，最初一张蜡纸只能印五十份。但是，陈然同志怀着一颗对革命的忠心，刻苦钻研，从蜡纸和纸张的特点，油墨稀稠，用力轻重等方面进行研究，改进技术，终于使每张蜡纸的印数提高到两千份。为了节省人力，避免暴露，根据陈然同志提议，编印工作由三人减为两人。随着《挺进报》发行量的不断增加，他的工作日益繁重，每星期要刻写三、四张蜡纸，印完之后折页、伪装，再用各种方式投寄出去，工作经常通宵达旦，白天还要赶到工厂工作。后来，除了印报，还印刷一些小册子，如《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土地法大纲》等，使党的方针、政策在国民党统治区得以传播。

由于《挺进报》的影响越来越大，引起了国民党特务机关

的注意和恐慌。一九四八年四月二十日，党组织通知陈然同志：党内出了叛徒，要提高警惕，随时准备撤离。后来，他又收到一封密信：“近日江水暴涨，闻君欲买舟东下，仅祝一帆风顺，沿途平安。”陈然同志知道形势严重，但他不愿舍弃即将出版的最后一期《挺进报》，决定印完再走。但是，十分不幸，四月二十二日正当他印完最后一张报纸准备离开之际，突然被特务逮捕。

陈然同志被捕后，被关押在“中美合作所”白公馆看守所。敌人威胁利诱、施以酷刑，逼他供出组织关系，但他坚贞不屈，只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挺进报》从编辑到发行，都是他一个人干的。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优秀品质和英雄气概。在狱中党支部的领导和难友们的帮助下，陈然同志利用半截铅笔和废纸烟盒，把有关解放战争胜利的消息写下来，在难友中传阅，鼓励难友们坚定信心，坚持斗争。

陈然同志在狱中曾向难友口述过自己将要完成的一首诗《我的“自白”书》：

“任脚下响着沉重的铁镣，
任你把皮鞭举得高高；
我不需要什么自白，
哪怕胸口对着带血的刺刀！

人，不能低下高贵的头，
只有怕死鬼才乞求‘自由’，
毒刑拷打算得了什么？

死亡也无法叫我开口！

对着死亡我放声大笑，

魔鬼的宫殿在笑声中动摇；

这就是我——一个共产党员的自白，

高唱凯歌埋葬蒋家王朝。”

这一革命英雄诗篇，充分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高贵的革命情操和彻底的革命精神。

一九四九年十月二十八日，在重庆解放前夕，陈然同志等十位革命同志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于渣滓洞附近的大坪。在刑车上，他们高唱《国际歌》，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临刑时，陈然同志昂首挺胸，拒不下跪，身中数弹仍未倒下，最后高呼口号，壮烈牺牲，终年仅二十六岁。

江竹筠



江竹筠同志，女，四川省自流井（现自贡市）人，生于一九一九年。

江竹筠同志八、九岁时，跟母亲和弟弟从家乡来到重庆，投奔在重庆开医院的舅舅家。后来，她又和母亲一起进了袜厂当工人。她虽然年纪小，但心灵手巧，很快成了熟练工。一九三三年前后，因弟弟患病需要照料，而厂方又不准

技术熟练的江竹筠单独辞退，母女俩被迫同时离开袜厂。后来，母亲为生活所迫，只好又到舅舅家帮忙，江竹筠和弟弟进了孤儿院读书。她深知生活的艰难，读书不易，因而异常勤奋，学习成绩总是名列前茅，曾连续两年跳级。她和其他几位同学的突出表现，引起了丁尧夫老师的注意。丁老师谆谆善诱，经常引导他们阅读一些进步书刊，如“创造社”①、

“太阳社”^②过去的出版物，以及鲁迅的《狂人日记》等，对她启发教育很大。她追求进步，渴望光明。一九三五年，她们敬爱的丁老师，突然被国民党当局以“共产党”的罪名逮捕。这件事使江竹筠同志进一步认清了反动派的反动嘴脸，认识到共产党好，产生了“要寻找共产党”的信念。

一九三六年秋，江竹筠同志小学毕业后，考入重庆南岸中学。抗日战争爆发后，学校迁到重庆市郊区复兴关。在当时民族存亡的严重关头，广大爱国青年学生积极行动起来，开展救亡运动。江竹筠同志和同学们一起搞宣传，演戏、办壁报，积极投入到这一伟大的斗争中去。学生们的爱国行动经常与学校反动当局发生矛盾，因而学潮不断发生。一九三八年十月，国民党政府放弃武汉后，大片国土进一步沦陷，更加引起广大人民群众的不满，学潮进一步高涨。

一九三九年春，江竹筠同志考入四川巴县兴隆场的中国公学附属中学读高中。当时，校内一些反动分子，经常对进步师生监视、恐吓，竭力破坏共产党的政治影响，不准师生订阅进步报刊，甚至随意传讯和开除进步学生，并在学生中拨弄是非，制造纠纷，煽动本地学生和外地学生之间的冲突，以削弱学生的政治热情。校内进步师生在我党的领导和影响下，与反动分子开展了斗争。江竹筠同志在斗争中态度坚定明朗，政治觉悟进一步提高。是年秋，经戴克宇同志介绍，她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入党前的一个深夜，戴克宇和她谈到入党后会遇到各种艰难困苦，随时有牺牲的可能，问她是否再三考虑过这些问题。江竹筠同志毅然回答道：“要革

命还怕什么，革命本身就不是什么安乐与享受，我既然决定入党，就是决心把自己的一切贡献给革命事业，甚至宝贵的生命。”

一九四〇年秋，江竹筠同志考入中华职业学校会计训练班。她和班上的共产党员同学一起，团结进步同学，同三青团反动分子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一九四一年一月，“皖南事变”发生后，国民党顽固派大造反革命舆论，污蔑新四军“不听军令、政令”，妄图混淆视听。为了使师生们了解“皖南事变”的真相，揭露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阴谋，江竹筠同志在学校散发了周恩来同志为“皖南事变”的题词和十八集团军声明，以及宋庆龄、何香凝、柳亚子三人的声明，在校内引起了很大的震动。

一九四一年秋至一九四二年秋的一年中，江竹筠同志曾在重庆妇女慰劳会工作，以后，由于重庆形势紧张，一度前往綦江。一九四三年初，她又回到重庆，在国民党政治部第三厅所属合作社工作。由于该合作社要求所有工作人员都必须参加国民党，江竹筠同志根据党组织的指示，于四月底离开合作社，在重庆作党的通讯联络工作。

一九四四年初，党组织先后派何理云、江竹筠和庞佑亲等同志前往成都，从事党组织的发展工作。为了便于开展青年学生工作，同年六月，党组织指示江竹筠同志投考四川大学。江竹筠同志仅有高中二年级学历，并且离开学校已经多年，学业荒废，马上去考大学是有很大困难的。但是，她为了完成这一任务，刻苦学习，废寝忘食，经过三个月的努

力，终于在同年九月考入四川大学农艺系。

一九四五年，江竹筠同志与共产党员彭咏梧同志结婚。一九四六年四月，在成都生下了儿子彭云。为了更好地开展革命工作，在她再三要求下，医生为她做了绝育手术。下半年，她回到重庆，先在伪中央信托局工作，后又在观音岩附近的敬业中学任教，以此为掩护开展党的通讯联络工作。一九四七年二月，内战形势更加严重，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和《新华日报》社的工作人员，被迫撤离重庆后，中共重庆市委工作任务加重，江竹筠同志便辞去社会公开职务，专职从事党的通讯联络工作，并于一九四七年下半年，在重庆参与领导了育才中学、女师学院、西南学院等学校的学生运动。为了把全部精力投入革命工作，她将儿子托亲友抚养。

一九四七年底，为了适应四川东部农村革命斗争迅猛发展的需要，根据党的指示，彭咏梧和江竹筠同志等，去下川东地区工作。起初，江竹筠同志在云阳县协助彭咏梧同志到各地了解群众运动的开展情况，并恢复和建立党的组织。一九四八年一月，她和彭咏梧同志等，在奉节县的黄莲乡发动武装起义，并攻下了云阳商业重镇兰溪。革命斗争的胜利，鼓舞她更加积极地在群众中开展宣传和组织工作，动员农民群众参加和支援起义队伍。起义胜利后，随着革命武装和政权的建立与发展，急需增加干部，彭咏梧同志派江竹筠同志回重庆接一批干部并筹措一笔经费。江竹筠同志克服了许多困难，胜利地完成了这一任务。

一九四八年二月，彭咏梧同志带领起义部队在北进大巴